

# “大国经济史：中国贸易规模和市场演变” 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 纤

2023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大国经济史:中国贸易规模和市场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议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主持,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晓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高超群研究员先后致辞。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专家们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史,围绕中国贸易规模和市场演变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下面就相关研讨略作综述。

## 一、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市场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市场是国民财富增长极为基础且重要的环节。市场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分工的范围,从而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在可能性,最终决定了国民财富增长的可能程度。<sup>①</sup>多位与会专家紧紧围绕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市场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

清华大学历史系陈争平教授探讨了中国近代铁路建设和市场演变,指出中国传统市场体系虽然有较大活力,但又是残缺的,它有一大短板:长距离贩运过度依赖大运河。这种依赖有三大问题:一是大运河毕竟是位于东部的南北货运线,不能惠及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二是黄河水害等经常影响大运河,使得运河浅梗,河运困难;三是由于各级官府贪污聚敛,运河沿线农民负担极为苛重,往往激起民变。反政府武装只要在大运河千里行程中占据某一点,就会威胁并很可能切断国家统治命脉,造成全局恐慌。这些问题千年来一直存在并制约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清后期制约更为严重。到近代,中国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较大变革,特别是铁路运输,铁路是工业化的产物,它对市场化发展有重要影响。陈争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应当理清大国“工业化”和“市场化”结合发展的来龙去脉,并用新视角对铁路发展史进行考察,非常有启发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黄纯艳教授基于中国视角,试图从海外贸易的作用(即“御夷狄”与“通财用”)来分析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他认为传统研究在“开放—封闭”的框架之内分析古代海外贸易政策:一是容易陷入二元对立分析;二是难以全面揭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三是“开放”“封闭”只是观察者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主观评价,政策自有其政治经济目标下的内在逻辑。基于此,他认为要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避免限于“闭关—开放”的二元判断和类型分析,需要进行充分的比较研究,做长时段和更为深入的考察。这为我们研究古代海

[作者简介] 宋纤,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师,长沙,410000,邮箱:songqian@hunnu.edu.cn。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外贸易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启发。

此外,还有三位年轻学者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对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宋代的商业和市场进行了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彭丽华副教授对宋代的桥市做了具体的研究,她指出宋代桥市商业业态类型多样,销售结构完整。桥(渡)市的发展,及桥梁(渡口)控扼水陆交通的地理优势,让桥(渡)市成为宋代设置征税机构的重要选择,桥渡处也多置有过锁以拦截往来船只与陆路商货。然而桥上的店铺、占栏的货摊等,会影响到桥梁的通行功能及桥梁的寿命,政府也需要对其加强管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唐清研究了宋代河流对市场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认为河流能够通过集聚效应作用于市场规模的扩张,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人工运河主要通过产业集聚影响市场规模,而自然河流主要通过人口集聚影响市场规模。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圣喆试图利用计量模型来分析人口压力和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农作物、人口结构和交通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深化认识人口和土地要素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和市场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00—1800年间,西欧经济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西欧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除了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外,也引发了其制度变迁。<sup>①</sup> 扩大的贸易和市场似乎为西欧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sup>②</sup>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和市场也成为与会专家探讨的主要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教授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了三次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在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第一次经济全球化:15—18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工业革命前),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顶端,并且欧洲在18世纪出现“中国热”,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局限,中国在这次全球化中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成产业资本。第二次经济全球化:1815—1914年(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国家,主要为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通过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中国加速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型。第三次经济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是这次全球化的最大获利者。邹进文教授也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中国能否主导这次全球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燕红忠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他认为根据各方参与者实力消长、汇率波动情况以及货币制度、国际汇兑领域的不同,近代中国外汇市场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产生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现代意义外汇市场的建立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快速发展阶段(一战爆发至法币改革);危机与转型阶段(法币改革之后)。近代中国从多维度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外汇市场,然而并未形成统一的外汇市场,但是近代中国外汇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因为进出口商品缺乏汇率价格弹性,形成了“双入超”现象,白银汇率的长期贬值则造成了严重的“镑亏”问题,对近代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宋纤博士试图将晚清时期的香港自由港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并对“土地财政”与香港自由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自由港政策,该政策能够得以长期实施的保障便是“土地财政”带来的收入。此外,湖

<sup>①</sup>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Jun. ), pp. 546–579.

<sup>②</sup> 武力:《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西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9期。

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妍借助测度模型,从合理性及可行性出发,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判断相邻空间单位的经济相关程度,研究了银行业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 三、国家能力、制度变迁和大国兴衰

与会专家除了对中国国内和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和市场进行了广泛探讨外,还从财税、民生、国家能力和制度等方面对大国兴衰进行了探讨。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在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尤其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关注和梳理了隋唐时期的财税情况与其盛世的形成:隋初实行了“轻税之法”,虽然纳税者负担有了明显的降低,但因为纳税对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使得隋代出现了“开皇盛世”;唐代建中元年(780)实行的“两税法”,实际上是隋初“计户征税”的继续和深化,使得唐代在藩镇割据环境下依然维系了150年之久,且出现了数次中兴。此外,这也反映了财税改制的趋势:简化税收,降低纳税对象的税收负担,而政府专卖的范围(包括盐铁专卖、榷酤、茶叶专卖等)在扩大,政府税收数量实际上是在增加。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唐任伍教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生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民生救国(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民生立国(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民生富国(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民生强国(2012年11月至今)。并基于“五民”(民生、民权、民主、民心以及民族)思想逻辑以及“五生”(生命、生存、生活、生产和生态)实践逻辑构建了民生发展一般理论,非常具有启发性。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教授及她的博士研究生金靖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对宣统户口调查进行了详实的解析。宣统户口调查是清廷在全面危机下构建“易读性”的尝试,其希冀通过户口调查,获取全国人口的真实信息,以此推行各项新政,全面提升国家能力,实现“御侮自强”;但由于不规范的章程设计、不完备的机构建设、不合理的经费负担,加之不断加深的内外危机,此次人口普查并未实现清廷“编户齐民”的愿望,反而导致反调查风潮迭起。基于此,他们认为宣统户口调查暴露了近代中国构建基础性权力面临的困境:“内外危机带来的紧迫性”与“基础性权力构建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下,清廷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资于强制性权力,而不愿意投资于见效缓慢且间接的基础性权力。

湖南工商大学盛小芳博士通过对晚清《公司律》实施效果的检验,探讨了法治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认为晚清《公司律》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作用在部分地区是有效果的;但其实施并没有推动全国性现代企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湖南师范大学曾雄佩博士主要介绍了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与复旦大学国民合作银行等学校银行的创办经历、股份来源、管理模式和业务范围,并通过追踪部分商科实习生取得的成就来探讨商科大学生的作用和地位,反映了学校银行实践教育的效果。

本次研讨会还设置了专家点评环节,与会专家针对参会的青年老师和学生提交的论文做了点评,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背景、新的材料以及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会议闭幕式上,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中心主任欧阳峤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意义和收获,对与会专家研究的主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科和经济史学科所取得的成就。

(责任编辑:马烈)